

共同文化：走出文化危机的必由之路——重读《文化观念》

The Common Culture as a Way out of Cultural Crises: *The Idea of Culture* Revisited

殷企平 (Yin Qiping)

内容摘要：关于伊格尔顿的《文化观念》，有两个相关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探讨。其一，贯穿该书的主线是什么？其二，作者一方面强调“共同文化”，另一方面又声称文化“变得傲慢与自负了”，其间的张力该作何解释？对于此，很多人的解读是：文化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情况果真如此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从“文化危机”说起。虽然伊格尔顿的“共同文化”一说得益于威廉斯，但是伊格尔顿进一步把“趣味”元素揉进了共同文化理论。他把“趣味”等同于“信仰和行动的公共性”，正是这种公共精神，构成了共同文化的精髓。

关键词：《文化观念》；伊格尔顿；共同文化；文化危机；公共精神

作者简介：殷企平，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与西方文论。

Title: The Common Culture as a Way out of Cultural Crises: *The Idea of Culture* Revisited

Abstract: Regarding Terry Eagleton's *The Idea of Culture*, two issues are still worth exploring. First, what is the main thread that runs throughout the book? Second, in what way can we expla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common culture," which Eagleton emphasiz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ulture that Eagleton describes as having grown "immodest and overweening" on the other hand? Many people have misinterpreted Eagleton's views and claimed that, to him,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s on the wane. Is that true? In order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need to deem as a point of entry what Eagleton calls "culture in crisis." Although his idea of "common culture" is derived from Raymond Williams, Eagleton has further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common culture into which he has incorporated the element of "taste." He sees taste as tantamount to the "commonality of belief and action," and it is precisely this kind of public spirit that constitutes the quintessence of common culture.

Keywords: *The Idea of Culture*; Terry Eagleton; Common Culture; Culture in Crisis; public spirit

Author: Yin Qiping, Ph.D.,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qipyin@hotmail.com).

在文化观念史上，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化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 2000）堪称集大成之作。虽然学界对于它已有不少专论，但是有两个相关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其一，贯穿该书的主线是什么？

其二，作者把文化的“傲慢与自负”放在全书压轴的位置，这该作何解释？

初涉《文化观念》者，大都有枝蔓丛生的印象，一时摸不着方向。然而，细细品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全书有一条主线，它围绕着两大话题而展开：1）文化陷入了何种危机？2）如何走出危机？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文化的不同说法”（*Versions of Culture*）可看作楔子，随及引出的第二章“危机中的文化”（*Culture in Crisis*）和第三章“文化战争”（*Culture Wars*）对应上述第一个话题，而第四章“文化与自然”（*Culture and Nature*）和第五章“走向共同文化”（*Towards a Common Culture*）则对应上述第二个话题。

从上述主线可见，《文化观念》的诞生是为了应对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化危机”，而应对策略则是上文所说的“共同文化”。问题也就来了：《文化观念》的结尾处在强调“共同文化”的同时，又声称文化“变得傲慢与自负了”，并主张“把它放回本位”（131）¹。此言一出，引起了很多反响，不过最多的是一种误读——很多人的解读是：文化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情况果真如此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从“文化危机”说起。

一、从“文化危机”到“文化战争”

《文化观念》第二章的标题就是“危机中的文化”。在该章第一段中，作者挑明了全书的核心观点：“本书的论点是：我们被夹在了两种文化观念的中间，一种大而无当，另一种僵化刻板，因而当务之急是两者都要超越”（32）。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

伊格尔顿所处的时代，可以用“文化热”来形容：人文社科领域，几乎没有一块未被“文化话语”冲击的地方。乍一看去，这似乎是一种喜人的现象。然而，凸显二律背反意味的新问题来了：“文化热”大潮之下，是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话语——文化“吃香”，因而谁都想顶着它的名分。可想而知，这会

¹ 本文有关《文化观念》的引文均来自 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0)。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文学批评会遭受伤害。恰如聂珍钊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一些“打着文化批评（……）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存联系”，只注重“对某个文化命题的求证，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聂珍钊 44）。另一个大问题则已由马海良先生所指出：“‘文化热’隐含的内在矛盾”导致了“贯穿于现代时期”的“文化危机”，后者“表现为现当代主流文化话语对文化的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以及政治性的漠视和掩盖”（113）。由于文化“吃香”，因此谁都拿它当大旗，而当它指称一切时，自然就会变得空洞。关于这一点，不少研究伊格尔顿的学者都已经发表了见解，其中以马海良先生的阐释最为简明：“现代‘文化’概念从替换‘文明’开始，一路不断繁殖，到后现代主义时期膨胀成为包揽一切的最高能指，伊格尔顿称之为‘唯文化论’或‘文化主义’（culturalism）。当‘文化’成为一个无所不能容纳的概念时，也就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没有意义内涵的空洞符号”（马海良 116）。不无悖论意义的是，此处所说的“包揽一切”往往走向其反面：各路话语都顶着“文化”的名头，看似后者包揽了一切，实则此文化非彼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很狭窄。这就是上引文字中“文化主义”的要害所在，或者说是后现代主义的要害所在。这一点已由刘静和冯伟说得很清楚：“进入后现代，文化以无所不在的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主义，首先是因为它拒绝承认不同种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所共有的东西比文化差异更为重要。而正是这些东西关乎着政治解放。后现代的偏见不断地腐蚀、破坏作为对文明的批评的文化。文化概念作为批评或乌托邦的维度迅速地衰落”（刘静 冯伟 38-39）。换言之，“‘文化’由曾经俯瞰和统辖整个人间事务的第一原子分裂为‘不同的’差异性形态，‘文化’裂变为‘各种文化’”（马海良 116），这是当年阿诺德乃至威廉斯等人都未曾料到的新问题。

应该说，上述新问题——亦即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很复杂。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文化”一词本身的特殊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就像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化”是“英语语言中两三个最复杂的单词之一”，而且“很少有比‘文化’更成问题的词语了”。¹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它历经千变万化，最终“把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在了单个概念之中”（1-2）。换言之，“文化”一词经过长时期的演变，派生出了许多复杂的内涵和外延。更复杂的是，它最初的语义就呈复合态势，而且是复合了二元对立的内涵：“如果文化最初的意义是耕作，那么它既暗示着规范，又暗示着自然生长”（4）。随着语义演变的深入，这种二元对立的趋势也愈演愈

1 参见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Flamingo: Fontana Press, 1983, 87; 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0, 1; Patrick Fuery and Nick Mansfiel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New Humanities: 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xviii.

烈，就如伍晓明所说，文化观念包含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解构”（伍晓明 122）。正因为如此，《文化观念》从篇首就开始分析“文化”一词所含的二元对立式涵义——这些涵义成双成对，却又互相矛盾。略举数端如下：

乡村生活 (rural existence)	vs	城市生活 (urban existence)
自然生长 (natural growth)	vs	约束管理 (regulation)
养猪业 (pig-farming)	vs	毕加索艺术 (Picasso)
耕种土地 (tilling the soil)	vs	分裂原子 (splitting the atom)
制作 (making)	vs	被制作 (being made)
率性 (spontaneity)	vs	理性 (rationality)
自我实现 (self-realization)	vs	自我克服 (self-overcoming)
高级官能 (higher faculties)	vs	低级官能 (lower faculties)
实际行成的 (what has actually evolved)	vs	应该形成的 (what ought to evolve)

(1-6)

以上列表只反映了文化观念丰富内涵中的一小部分，不过它们都具有代表性。伊格尔顿所分析的内涵都具有二元性，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两面性” (facing both ways)：“文化作为一个词语具有两面性。它还暗示我们自身内部就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行使培养和冶炼的功能，而另一部分则构成了供冶炼的原材料” (5)。此处所说“行使培养和冶炼的功能”就是上表中的“高级官能”，而“供冶炼的原材料”则是与之对应的“供冶炼的原材料”。

正是因为上述繁冗驳杂的语义内涵，“文化”一词即便暂时不受历史、社会语境变化的影响，也会因其内在张力（不同乃至相反的语义彼此互动或博弈）而处于一种动态之中。更确切地说，“文化”一词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不调和的种子。面对这些不调和的种子，伊格尔顿立下了两大功劳：1）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理出了一个具有共性的头绪，即（如上文中所暗示的那样）众多语义彼此间都有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2）在扑簌迷离的线索中导出主线索，即勾勒出了“文化”与“文明”分道扬镳的轨迹。¹然而，理清这些头绪，并不能让人一劳永逸。伊格尔顿清楚地看到，“文化”概念并非生活在真空当中，它的“每一次使用都反映了历史语境对‘意义’的调整需求”（马海良 115）。由于前文所述的新历史语境，即各路话语 / 理论争相标举“文化”大旗的情境，因此出现了新的文化危机²，其“征兆表现为对历史条件的掩盖、意

1 参见 殷企平编：“总序”，《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6卷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

2 笔者此处之所以用了“新的文化危机”，是因为文化史上其实危机不断。伊格尔顿本人也承认，“宣称文化观念如今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何时不在危机之中呢？”参见 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0, 37.

图与效果的冲突和自我涂写与抹除的矛盾”（马海良 115）。这一新的历史条件，反过来会激活我们前面所说“不调和的种子”——虽然各类理论都标举“文化”，但是每类理论（以及操弄理论的各种势力）其实有不同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只认同了文化观念众多内涵中的某些部分，那就必然会带来新的“不调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同韩伟和徐蔚两位学者对《文化观念》的解读，即“文化的危机是文化认同的危机”（韩伟 徐蔚 11）。可能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伊格尔顿才在第一章中大书特书“文化的不同说法”，以此为其后讲危机的两章做铺垫，进而为最后一章（讲如何走出危机）埋下伏笔，也就是为全书奠定基础。

上述危机一直呈愈演愈烈的趋势，以致伊格尔顿只能专辟一章（第三章），并冠以“文化战争”的标题，以显示其激烈程度。该章开宗明义：“‘文化战争’这个短语暗示混战，即民粹主义者与精英主义者之战、经典监护人与**差异**¹信奉者之战，以及已故白种男性²与被不公平地边缘化者之间的白热战”（51）。此处须特别留意的是“差异”一词：参加混战的“文化斗士”其实是各自为战，各为其“主”（各自不同的文化主张）。用韩伟和徐蔚的话说，伊格尔顿敏锐地发现“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对文化理解的差异导致了文化和政治的对抗”（韩伟 徐蔚 11）。当然，导致这场混战的还有不同性别对文化理解的差异，甚至有不同性取向者之间的差异——上引文字中的“被不公平地边缘化者”（the unjustly marginalized）就包括了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拥趸们。显然，这些不同的文化主张已经被注入了政治含义，或者说已经被政治化了。

使上述情形更为复杂化的是，伊格尔顿还发现“文化战争”不仅发生在不同性别、阶级和种族之间，而且还发生在“大写文化”（Culture）与“小写文化”（culture）之间。所谓“小写文化”，指的是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如女权主义文化和精英主义等。至于“大写文化”，伊格尔顿第一次在书中使用它时，称其为“浪漫主义、前马克思主义的名称，意在批判早期工业资本主义”（10）。在其后的阐释中，伊格尔顿又强调“大写文化”其实就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而“小写文化”则相当于“一种文化”（a culture），前者是比后者“更博大的、无所不包的形态”（38）。这种博大而无所不包的“大写文化”跟当年阿诺德等人的文化理想相吻合，其初衷是超越一切，超越任何狭小的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派利益，也就是超越任何“一种文化”，可是事与愿违，它不幸沦落到了无法对任何“一种文化”言说的境地，难怪伊格尔顿又称其为“无文化可言”（cultureless）：“大写文化的问题是它竟无文化可言：它的价值观不为任何具体生活形态所采纳；干脆地

1 原文 difference 为斜体，故译文用黑体与之相对应。

2 “已故白种男性”原文为 dead white males，常用来暗讽占据经典地位的都是些男性白种人，而且都已过世，亦即喻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僵化过时。

说，不为人类的任何实际生活所采纳”（53）。假如这一问题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那么它还不至于成为燃眉之急，但是在当今世界，它已然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然而，大写文化与小写文化之间的争执，不再仅仅是一场有关定义的争战，而且是一种全球性的冲突。它事关现实政治，而不只牵涉学术。它不单单是司汤达与塞恩菲尔德之间的争斗¹，也不仅仅是在英语系走廊上研究弥尔顿诗歌尾韵的那些家伙与专写手淫的那些聪明年轻人之间的争吵²，而是新千年世界政治格局的组成部分。我们将会看到，就政治而言，尽管文化不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它却与我们的世界息息相关——在这个世界上，三个最富有者的财富相当于六亿个赤贫者财富的总和。文化战争关注的是种族清洗这类问题，而不是拉辛³与肥皂剧孰优孰劣这样的问题，因而是非常要紧的。（51）

伊格尔顿此处用了“要紧”一词，这说明他虽然把“文化战争”看作一种“混战”（详见本段的上文），却很重视后者关注的现实问题，或者说他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视之为文化所面临的新任务。有趣的是，他把文化承担新任务这一现象描绘为“文化膨胀”（the inflation of culture）：“文化膨胀是世俗化时代故事的一部分，就像文学那样——自阿诺德以降，它居然率先承担起了伦理、思想乃至政治方面的重任！这些任务先前是由更偏重技术和实用的话语来承担的”（40）。须说明的是，此处的“文化膨胀”与前文所说“文化”概念的膨胀（即变成包揽一切的最高能指）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后者侧重概念内涵的过度扩张，而前者则强调文化承担的各类新任务，包括政治任务。

我们不妨把上述现象称为文化的“政治转向”。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文化已经具有了一种新的政治重要性”（131）。从伊格尔顿的总体思想来看，他是认可这种转向的，但是他同时又面临如下困境：在名目林立的文化理论中，有没有一种理论能脱颖而出，引导世人既真正承担起政治重任，又不至于陷入上述混战呢？我们将在下一小节对接这一话题。

二、走向共同文化

该怎样走出上述文化危机（“文化战争”只是它的一种激烈形式）呢？根据伊格尔顿的分析，“小写文化”显然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大写文化”呢？前文提到，“大写文化”志在超越任何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派的狭隘利益，但

1 司汤达（Stendhal），原名 Marie-Henri Beyle，法国小说家；塞恩菲尔德（Jerome Allen Jerry Seinfeld），美国好莱坞喜剧演员、剧作家、电视与电影制片人。伊格尔顿用他俩来代表经典艺术与通俗艺术之争。

2 “聪明年轻人”原文为 bright young things（可直译为“聪明而年轻的东西”），含讥讽的意味。

3 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法国剧作家、诗人。

是它同样无所作为。用伊格尔顿的原话说，因为“大写文化”“无权过问人间烟火”（has no title to intervene in sublunary affairs），所以它“救不了我们”：“大写的文化之所以拯救不了我们，是因为它其实并不认为自己受历史条件限制，因而也就无权过问人间烟火”（86）。此处所谓“不受历史条件限制”，就是马海良先生所说的“现当代主流文化话语对文化的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以及政治性的漠视和掩盖”¹，而这一状况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马海良 113）。既然“大写文化”无所作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那么要走出文化危机，还是要从批判资本主义入手，而伊格尔顿的思路也是这样展开的。这一点在刘静和冯伟的笔下有过较好的解读：

威廉斯时期文化的政治正在演变为文化政治，进而可能堕入文化取代政治的意识形态陷阱。面对这种理论迷失，伊格尔顿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批判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种种弊端，揭示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文化在后现代的过度膨胀掩盖了其无力的表现。在他看来，文化不足以作为政治的替代来行使政治批评功能，文化的自大具有严重的后果，摆正文化的位置成为当今理论研究刻不容缓的任务。（刘静 冯伟 37）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文字中有“文化的自大”一语。确实，伊格尔顿在《文化观念》的结尾处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前面已经引用了该书的倒数第三句，即“文化已经具有了一种新的政治重要性”，而其后的两句是这样写的：“但是它同时也变得傲慢与自负了。在承认它具有意义的同时，是我们把它放回本位的时候了”（131）。本文引言部分中已经提到，学界不少人对这段话有误解，把它等同于文化位置的贬低。这难道真是伊格尔顿的本意吗？

诚然，把文化的“傲慢与自负”放在全书压轴的位置，这似乎是要铁板钉钉，至少是语出惊人。然而，我们仍须问一句：这话是针对什么讲的？是在什么语境下讲的？首先，它是作为第五章（也作为全书）结束语讲的，而这一章的标题是“走向共同文化”。就行文逻辑而论，起点题作用的自然是相关章节的标题，而该章居于压轴位置的语句自然是要为所在章节题目服务的。进一步说，“走向共同文化”作为《文化观念》全书的压轴章，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那么它用来压轴的最后两句——“但是它同时也变得傲慢与自负了。在承认它具有意义的同时，是我们把它放回本位的时候了”——必然是服务于全章中心论点的，即提倡共同文化。换言之，“共同文化”与“傲慢自负的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其间正是众多关于文化的“不同说法”及其相关危机/混战。这一形式上的张力本身就在传达一个信息，即共同文化将要战胜自大的文化，从而走出全书所分析的文化危机。从行文手

1 详见本文第一小第二段。

段来看，另一个文本细节也值得推敲：上引“变得傲慢与自负”一句其实又受到了其后（即最后）一句的限定——作者主张把文化“放回本位”，而这放回本位的文化就是共同文化，是与自大的文化相对立的。不仅如此，限制“变得傲慢与自负”这一句的还有其上文——同一段的首句和第二句是这样写的：“文化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131）。还有比这更强调文化重要性的吗？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在书尾提出“傲慢自负的文化”一说，丝毫没有贬低文化重要性的意思。那么，他为什么要那样说呢？学界炒作“傲慢自负的文化”一说的人们还常常拿伊格尔顿的另一本书《文化》（*Culture*, 2016）说事，该书的结语部分有一个小标题，叫作“文化的傲慢”（*The Hubris of Culture*）。事实上，这一标题是有歧义的。我们应该细究的是，伊格尔顿是在说文化本身的傲慢呢，还是某些文化工作者的傲慢？抑或是某种文化理论及其拥趸的傲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文化》的具体文字。就在以“文化的傲慢”为题的结语中，伊格尔顿一上来就说：“文学批评家们一直对自己的重要性存疑”（Eagleton, *Culture* 149）。此处的“文学批评家”主要指教授文化知识的大学教师，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都存疑，难道会傲慢吗？紧跟着上一句，伊格尔顿又这样说：“文学应对的是人类现实中最根本的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Eagleton, *Culture* 149）。这分明是强调了文化——文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的重要性，那么“傲慢”又从何谈起呢？到了第三句，我们才看清楚：“自从文学作品的研究抛弃了公共领域，躲进了学术界，它就成了次要活动，这种边缘化的程度使人不难想象大学文学系正在成为明日黄花（确实，整个艺术人文学科都如此）”（Eagleton, *Culture* 149）。原来伊格尔顿是在批评那些抛弃了公共领域的人文社科工作者！伊格尔顿用上述三句话，揭示了一个具有悖论意义的现象：一方面，许多文化工作者“躲在象牙塔里，无视普通读者，不屑于构建公共领域”（李睿 殷企平 62-63），因而他们是傲慢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孤独的、缺乏自信的——由于他们躲在了象牙塔里，因此就陷入孤立，自然也就有了“对自己的重要性都存疑”一说。

《文化》中批判的“傲慢”，早在《文化观念》中就遭到批判了。前文述及的各类“小写文化”大都有傲慢的毛病，大都躲在象牙塔里，不屑于构建公共领域。它们之所以陷入混战，是因为它们拒绝承认“共有的东西比文化差异更为重要”¹。作为一个有人类大同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必然想超越导致文化危机/战争的差异，必然要寻求走出危机的文化策略。那么，貌似具有超越性的“大写文化”是否可行呢？遗憾的是，它也无济于事，其原因是它“不食人间烟火”，或者说“并不认为自己受历史条件限制”²。须顺带提一句：不食人间烟火，也是一种傲慢。

1 详见本文第一节第二段和第五段。

2 参见本节第一段。

正是鉴于“大写文化”和“小写文化”都难有作为的情况，伊格尔顿把目光投向了共同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共同文化”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首先提出来的。后者在1958年分别发表论文“文化是普通的”（“Culture Is Ordinary”）和专著《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并在里面都阐述了他的共同文化观。在《文化是普通的》一文中，他这样说道：“在下半个世纪中，我们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用新资源来营造一种良性的共同文化”（Williams, “Culture Is Ordinary” 17）。在《文化与社会》中，上述“核心问题”更凸显出迫切性，被摆在了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我们需要一种共同文化，不是为了有一个抽象原则，而是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336）。在威廉斯看来，共同文化跟“共同体”（community）、“沟通交流”（communication）和思想/知识的“传播”（transmission）息息相关：

{……} 传播永远是一种奉献 {……} 它不是要控制，而是要沟通，是要让人采纳和响应。人们是否积极采纳你所传播的东西，是否踊跃响应，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体验共同体。可以肯定，这种交流的质量又取决于人们是否认可实际的平等。形形色色的不平等分裂了我们的社会，从而使人们很难有效地沟通交流，甚至无法交流。（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336）

上引文字中的“体验共同体”（community of experience）显然强调了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性和普遍性，或者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意思的是，伊格尔顿从中找到了共同文化的成因和立足依据。《文化观念》第四章“文化与自然”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一种共同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只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大致属于相同的种类，因而一种共性有赖于另一种共性。就像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所意识到的那样，即便我们在作为个体时，身体就带有社会烙印，而且比文化的烙印更深。当然，人的身体因历史、性别、种族、体能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他们在语言、劳动和性征等方面的性能则没有区别，这些性能使他们一开始就进入了一种彼此相连的关系，一种具有潜在共性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者鼓吹人的身体是后天构造而成的，这已经成了一种迷信。狂热崇拜这一观点的人虽然在批判先天论时显得很聪明，却与放弃抵抗资本主义的那些人沆瀣一气——他们抛弃的是与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性对抗的政治观，而这恰恰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寻求全球性霸权的时代，一个全球性霸权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咄咄逼人的时代。（111）

这段文字表明，共同文化赖以立足的基础是人的自然属性。前文提到，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拥趸们是否定人类自然属性/共性的，他们眼里只有差异和个性，而根本看不到人类在身体构造、语言、劳动和性征等方面的共性。假如他们的谬见只是停留在学术定义层面，那么其危害性还不至于很严重，但是他们正好跟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政治霸权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因此已经到了非反抗不可的程度。伊格尔顿敏锐地捕捉到了问题的症结，因此提出了建设共同文化的目标，并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可谓功莫大焉。还得顺带提一句：在本文引言部分，笔者把《文化观念》第四章和第五章一一对应于“如何走出危机”这一话题，这种对应关系由本段论述可见一斑。更确切地说，第四章为第五章中提出“共同文化”做了准备。

虽然伊格尔顿的“共同文化”一说得益于威廉斯，但是他并未停留在同一水平。这一点已经由马海良先生点明：“伊格尔顿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借用马克思的经济生产理论，以文学生产为个案，提出别具新意的文化生产理论。文化的历史性、物质性和实践性在伊格尔顿的理论建构中被综合描述为一种‘生产性’”（马海良 117）。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是他谋求走出文化危机的可靠资源；在他看来，直至今天的文化危机，其最大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整体生产方式及其文化生产方式”，而“解决文化危机的关键是解决文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推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实践”（马海良 118）。我们还须补充一点：伊格尔顿比威廉斯更进一步的地方，还在于他把“趣味”元素揉进了共同文化理论。下面这段论述可以为证：

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论（……）不会受到激进主义杂糅论者和自由主义多元论者无保留的欢迎，这是因为它必然需要一种信仰和行动的公共性，而这几乎是不合他们趣味的。威廉斯的立场是一个悖论：这种复杂的文化发展的条件，只有通过政治上确保某种手段才能设定——他把后者相当含糊地称作“共同体手段”，而实际上他指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共机构。这样做就肯定需要公共的信仰、承诺和实践。只有通过充分的民主参与，包括调节物质生产的民主制度，才能充分开放民主参与的通道，从而充分表达这种文化的多元性。简而言之，要确立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就需要齐心协力的社会主义行动。当代文化主义未能明白的，恰恰是这一要点。（121-122）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把趣味（见以上引文第二行）等同于“信仰和行动的公共性”，或者说“社会主义行动”所体现的“齐心协力”，也就是他在许多著述中强调的“公共精神”。¹正是这种公共精神，构成了共同文化的精髓。

1 参见殷企平：“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外国文学》6（2022）：71-80。

《文化观念》发表于二十年前，可是它如今读来仍然非常亲切。谓其亲切，是因为文化危机仍然存在，文化战争仍硝烟弥漫，资本主义全球性霸权仍在作祟，而共同文化仍不失为最佳解药。

Works Cited

- Eagleton, Terry. *Cul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2016.
- .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0.
- Fuery, Patrick and Nick Mansfiel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New Humanities: 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 Melbourne: Oxford UP, 1997.
- 韩伟、徐蔚：“文化的危机与弥合——读伊格尔顿的《文化的观念》”，《文艺批评》1（2010）：8-12。
- [Han Wei and Xu Wei. “The Crisis and Bridging of Culture: Reading Eagleton’s *The Idea of Culture*.” *Literary Criticism* 1 (2010): 8-12.]
- 李睿、殷企平：“‘共同体’与外国文学研究——殷企平教授访谈录”，《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2021）：59-65。
- [Li Rui and Yin Qiping. “‘Community’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n Interview of Professor Yin Qiping.” *Fuda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orum* 2 (2021): 59-65.]
- 刘静、冯伟：“摆正文化的位置——伊格尔顿的文化观探析”，《理论月刊》2（2018）：37-42。
- [Liu Jing and Feng Wei. “Correcting the Position of Culture: An Analysis of Eagleton’s Cultural View.” *Theory Monthly* 2 (2018): 37-42.]
- 马海良：“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文化主题”，《文艺理论研究》2（2014）：113-122。
- [Ma Hailiang. “The Cultural Theme in Terry Eagleton’s Critical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 (2014): 113-122.]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Others*.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2.]
-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 . “Culture Is Ordinary.”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edited by John Higgins. Oxford: Blackwell, 2001. 10-24.
- .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Flamingo: Fontana Press, 1983.
- 伍晓明：“论伊格尔顿的文化观”，《浙江社会科学》4（2020）：122-127。
- [Wu Xiaoming. “Eagleton on Culture.”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4 (2020): 122-127.]
- 殷企平：《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6卷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
- [Yin Qiping. *British Literature midst Changes in the Idea of Culture* (6 volum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20.]
- ：“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外国文学》6（2022）：71-80。
- [—: “Towards Public Spirit: Eagleton’s Views on Taste.” *Foreign Literature* 6 (2022): 71-80.]